

作者前言

下文将就大众的特征进行探讨。

一个种族的所有特征是其个体特征的集合，而个体所具有的特征则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然而，观察结果证明，当一个种族中的某部分个体一旦聚集起来进行有目的的行动时，仅仅从他们聚集成群的这个事实来看，他们就存在着某种新的心理特征，而这些特征恰好都可以归入种族特征中去。如果经过深思熟虑的考究，这些新的心理特征有时候还会被划入一个新的类型中，以区别于原来的特征。

聚集成群的大众往往是种族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以前这种现象都被认为成不了大气候，从未像现在如此般影响力深厚。当今时代，有意识的个体行为已经代替了无意识

的大众行为，并且这已经演变为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我一直致力于用一种纯科学的方式来探讨大众带来的这个棘手问题。这种纯科学的方式是在不受外界观点、理论和学说的影响下进行的。我个人认为，如果要解决一种本身就会引起激烈争论的案例，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种有意识的个体行为案例，这种纯科学的方式就是唯一一种能够用来探讨和研究真理本质的方式。一个投身于科研工作的人在查证一种现象时，如果他不能够饶有兴趣地融入到他的研究对象中，那他的查证就会有失公允。对于这种观点，著名的思想家M·葛布利特·德·奥勒维拉（M.Goblet d'Alviela）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我偶尔会处于这样一种境地，那就是，我的观点跟每个学派所提出的观点都是相对的，而我却不是这众多的现代学派其中的一个。我希望，这个新的研究报告可以为大家提供一种类似的研究手段。因为如果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学派的角度来分析问题，那么所有的观点和论据都会有支持该学派的倾向。

上述观点的理由是，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最缜密的观察，我得出了一条规律：社会有机体跟其他事物一样，正在一点点地复杂化。最不理智的做法就是，人类利用自身的力量去迫使它们突然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有时候，大自然自有其自身方式来应对这种出其不意的改变，而且这种方式也不逊色于人类所采取的方式。从这种层面上来讲，这就意味着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民族迷恋于大刀阔斧的改革还要致命，不管这些改革在理论上是多么优秀。如果一定要说这些改革可以派上用武之地的

话，那就是它们能够在瞬间改变一个民族的智慧。然而，拥有这样的力量却需要经过岁月的洗礼。理念、情感和风俗一直在支配着人类，这些事物就是人类自身的本质。体制和法律都是人类性格的外在表现，也是人类对外界事物需求的一种表现。由于人类性格作祟，体制和法律都不会轻易改变其本质属性。

研究这种社会现象绝对不能够脱离民族，因为民族的存在是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可能会是一种绝对价值的存在，但实际上，它们的存在只是一种相对价值。

因此，当研究一种社会现象时，需要牢记的一点是，我们要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持续思考问题。从这个层面出发，那就存在纯粹理性教导和实践理性教导，这两种教导是完全相反的。前者几乎没有数据可循，即使是提到物质性的层面，很多时候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都不大。从绝对事实的角度来看，一个立方体或者一个圆形都是不可改变的几何图形，它们都是由特定的方程式来硬性规定的图形。但是，这些几何图形给我们的感觉却是，它们也可以进行任意变形。我们会认为，立方体可以变为一个角锥体或者一个正方形，而圆形可以变成一个椭圆或者一条直线。除此之外，这些虚构的图形比它们自身的形状要重要得多，正是因为对这些虚构图形有过思量，我们才让它们变为眼前的现实以及用摄影和照片把它们复制出来。在某些事例中，虚构的事物比真实的事物蕴含的真理还要多。如果要准确无误地通过事物本身的几何形状来展示它的话，这无疑会扭曲其本质，甚至会使其原本的面目难以辨认。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世界的所有居住者只能复制或者拍摄事物而不能亲手触摸它们的话，那么他们就很难对事物的形状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同样的道理，对于一种研究模式的知识，如果只是少数学者能够明白而其他人都望而却步或者一头雾水的话，这就会影响到其自身的可读性。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必须牢记一点，他们在获取理论价值时也要注重实践价值的积累。而后者是研究文明进程所要关注的核心部分，它是非常重要的事物。这就要求在认识实践价值的过程中，一切要以逻辑的思维为先，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谨慎思考才能下结论。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存在其他的动机，它们就像事先储备好一样，让哲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有醍醐灌顶的感觉。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就是如此，人类无法在整体上把握它们以及预示它们交互影响的结果。此外，有时候一些显眼的事实后面都暗藏着成千上万不显眼的原因。这些显而易见的社会现象似乎都是由一些漫无边际且无意识的活动造成的，一般来说，这些活动都超出我们的分析范围。也许可以用波浪来形容这些可感知的现象，它虽然是海洋表面一种现象，事实上却是隐藏在海洋深处的事物在作怪。就聚众这种行为来看，它本身就是一种异常低级的精神状态。但是，这种聚众的行为中似乎存在一些神秘的力量，这些力量就是祖先们一直自诩为命运、自然或者造物者的东西，也是我们称之为死亡之音的东西。即使我们能够忽视这些东西的本质，但我们无法跨越这些力量。有时候，一个民族似乎有一些内在的力量在引导它们。例如，

有什么东西能比一门语言更复杂，更具逻辑性以及更不可思议的吗？但是，如果追本溯源的话，有关语言这种具备组织性的产物的崛起，它们除了跟无意识的大众行为有关，我们还能找到其他的起源吗？那些最具学问的专业学者以及最出名的文法学者，除了能够记录管理语言的规律之外他们根本不能做什么，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不是语言的创造者。即便是提到伟人的思想，我们又是否能确切地说他们的智慧跟他们子孙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呢？毋庸置疑，这些观点都是从那些孤立的头脑中衍生出来的，但是这难道就不是大众的智慧吗？这种智慧就像集腋成裘的灰尘一样，最终演变成喷涌流动的土壤。

毫无疑问，大众的行为通常都是无意识的，但是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往往会成为他们优势的武器之一。普世当中，唯独生命是受本能的行为支配，这些行为以其不可思议的复杂性使我们感到震惊。理性是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慢慢习得的一种属性，而它还是一种需要日臻完善的事物，因此它不仅不能为我们展示无意识行为的规律，而且它还会在某一天被其他事物所替代。在人类的行为当中，无意识的那一部分都是漫无边际的，而由理性支配的那一部分却非常有限。因此，这种无意识的行为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在一个狭隘而安全的领域里研究科学，并让科学给我们带来知识之光，而不是在一个模糊而无用的猜测假设里无所事事的话，我们必须要把那些通俗易懂的现象记下来，然后站在大众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这个研究报告中的每一个结论，通常都被称为预想的结论。因为我们

用肉眼就能看清的现象后，存在着的都是我们本能就可以看清的其他现象，而也许后者中又隐藏着一些我们根本无法看清的现象。

引言 乌合之众的时代

现今时代的演变，或者说文明中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国民思想变化的结果。国民思想又被誉为现代的大众力量信仰，它改变了欧洲国家的传统政策，并且展示了大众阶级崛起的过程以及大众施展权力的方式，这些都是大众力量发展的必要结果。从这个层面上看，大众的出现绝非破坏的代名词，大众的共同施力作用使得许多衣衫褴褛的民众消失了。因此，大众心理普遍被忽略的这个问题应当被提上议程，让立法者和政治家们对其重要性共同进行探讨和研究。

很多时候，大动荡的剧变都是在文明出现剧变之前发生的。譬如罗马帝国的倾覆以及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它们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它们有这样的命运似乎都要归咎于政治改革，外

族入侵或者是王朝的瓦解。但是，我们需要多加注意的是，通过对这些事件进行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表面上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其实背后还藏着一个更为惊人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往往是最原始和最致命的，那就是民族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真正震撼我们心灵的历史剧变并不是先辈们的丰功伟绩或者暴力制裁。文明复苏中出现的种种影响，唯一的重要改变就是那些影响着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信仰的改变。历史当中记载的事件往往都跟人类思想发生的内在改变有关，正是出现了这些内在变化，那些外在的显而易见的改变才会随之而来。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如此罕见的原因是，一个种族当中没有任何东西会比他们世代相传的思想更坚不可摧。

人类的思想在新时代中处于一个临界点，那就是它们正经受着一场变革的洗礼。

这场变革起源于两种基本因素。一种是我们文明赖以生存的要素，它们指的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另一种则是在现代科学和工业发明之下出现的那些完全新式的生存和思想环境。

过去的思想即使已经有一半遭到破坏，但依然具有威慑力，而代替它们的新思想仍然处于演变进化的过程中，新时代就是代表着一段过渡以及无政府状态的混乱时期。

我们很难判断出这种注定混乱不堪的时期会演化出什么。这个时期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会从旧社会中继承到什么样的思想，什么的思想会成为这个新社会的正统思想，等等。目前我们对此一概不知。而如今众所周知的是，无

论未来社会依靠何种标准进行组织，它们都将需要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跟现代生存的统治力量一样重要，那就是大众的力量。之前有许多相关的理论被提上议程，这些当权政府的学说都在众多学派的讨论中被一一剔除掉，原因要么是因为今天它们失去了理论的效力而逐步走向衰落或者是惨遭淘汰，要么就是在接二连三的革命当中被废除掉。唯独一种力量——大众的力量历经沧桑而永葆青春，并且似乎有吞并其他力量的势头。当我们那些古老的信仰正摇摇欲坠并稍纵即逝的时候，当一个社会的古老支柱正让位于其他事物的时候，大众的力量是唯一一种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力量，它也是一种继续声名大噪的力量。实际上，我们将要进入的这个时代就是大众的时代。

仅仅一个世纪前，欧洲国家的传统政策以及主权国家的斗争都是引起其他事件的主要因素。当时，大众的看法几乎都被忽略掉，实际上它们很多时候都不会在应用过程中被采纳。如今，那些过去在政治上获利的传统以及统治者个人的看法和斗争都被搁置到一边，相反的是，大众的声音已经成为压倒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的存在，国王的权力才会受到限制和监管，而国王此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时刻记住这种声音的存在。现在，民族的命运都掌握在大众的手里，而不是议会的首脑手里。

大众阶级进入政治生活，也就是说，实际上，它们的改革已经取得长足性的进展，它们已经化身为管理阶级，这也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过渡时期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曾经有人认为，引入的普选权应该是这种政治权力交接过程当中的一个显著的

特征，但是这种权力经过长期执行后却发现效果微乎其微。首先，大众力量取得长足性的进展是因为某些思想的传播，这些思想后来慢慢地移植到人们的头脑中，而后通过个体之间关系逐步演变为理论的概念。正是通过这样的联系，大众才开始获取与他们利益相关的思想，而倘若这些思想在理论上算不上最公正的话，那它们总是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阐释，这样一来，它们就获得了一种意识上的优势。在当政者一个个屈服之前，大众总是像辛迪加那样的垄断企业一样联合起来；他们也会建立工人联盟，即使所有的经济法律都有限制工人及其薪酬的倾向。他们也会进行政府性质的集会，但那里的代表通常都缺乏主动性和自立性，并且这些政府性的集会一旦选出其委员会的代言人之后，它们都不会进行机构的简化。

如今，有关大众力量的理论正一步步得到强化，并且由于现在它已经完全成为摧毁社会存在的一把利器，这时有人提出，这种力量可以追溯到原始的共产主义，因为它是文明曙光来临之前人类全部群体的正常状态。限制劳动的时间，将煤矿、铁路、工厂以及土地国有化，平均分配所有的产品，为了大众阶级的利益而消灭上层阶级的利益等，诸如此类的都是这种理论的组成部分。

相反的是，大众在没有大幅度改动这些理论的情况下迅速地作出回应。于是，他们目前的组织以及他们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那些新生的教条里面都包含着旧式的教条的力量，也就是说，那些专制和主权力量都已经没有了商量的余地。大众神圣的权力正准备接力国王们的神圣权力。

倾向于中产阶级的作者，他们都是自身狭隘意见的最好见证者，他们的观点具有局限性，他们的质疑只停留在表面以及他们有时候会出现过度自大，总之，他们对这些新生的力量架起一种时刻防守的态势。并且，他们自诩正努力扫除面前的阴霾，那就是与人类思想中篡乱的那一部分作斗争。他们采取的斗争方式就是通过教会的道德力量来宣誓他们的主权，而这种力量却让他们的声称如此地狼狈不堪以及备受歧视。他们告知我们科学已经不复存在，嘱咐我们要带着赎罪之心重回罗马，并且时刻提醒我们那些已揭示的真理的教义。这批新的皈依者忘了他们已错过了亡羊补牢的最佳时刻——一切都太迟了。他们在受礼的时候是否真的有被以礼相待呢？我们都知道，如果追随者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即使他们被宗教信仰者以礼相待，他们受到思想影响绝对没有信仰者的程度深刻。大众都在批判现世，而这就是上帝的追随者们批判的昨天以及推波助澜想要毁掉的世界。这里根本没有力量，没有上帝也没有人类，更别提有覆水可收的力量。

这里不曾存在科学已经丧失的事实，并且在当今的知识无政府状态当中，科学根本无用武之地，更别提要这种混乱时期要把它运用到新力量崛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去。科学曾承诺会带给我们真理之光，或者是赋予人类智力可以接受的科学相关知识，可是，它从未许诺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以及幸福。于是，我们对主权漠不关心，我们也未曾因为失去它而悲恸。事实上，我们都应该为科学而奋斗终身，因为幻想一旦摧毁之后，任何事物都无法对其施展还魂的妙手回春之力。

在所有的民族当中，那些显而易见的普遍特征已经向人类展示了大众力量的迅速崛起之势，同时它也在与人类的一种猜想进行着不懈的抗争，那就是，这个民族注定早日走向衰亡。而对于人类而言，无论上天为我们安排什么样的命运，我们都要接受。任何反抗它的理由到头来都只是一派胡言。当然，大众力量的出现可能是西方文明进程的最后阶段之一，因为这个过程完全见证了那些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状态通常似乎都是一个新社会诞生之前的景象。但是，这种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吗？

到目前为止，一个摇摇欲坠即将崩塌的文明必然伴随着全面性的破坏，而这就是其留给大众的最亟待解决的任务。实际上，解决这一遗留任务的眼光决不能只停留在今天。历史告诫我们，从一个文明失去它赖以生存的道德力量那一刻起，它在瓦解的最终阶段总会伴随着一些无意识和残暴的群众活动，而对于这种活动，我们总有足够的理由称之为野蛮人的行为。然而，文明通常都是由一小群知识性的贵族创造和引导的，而非大众所为。大众所具有的只是强大的破坏力量。他们自设的规则往往跟野蛮这个阶段脱不了干系。一个文明总是会伴随着规则和纪律的修正，这个过程就是见证着大众从自觉到理性的状态的转变，一个对未来的展望的转变，一个文化程度的提高，这些在大众身上体现出来的转变都切切实实地证明一个事实——大众一直都不具备意识的能力。因此，从大众身上具备的力量来看，这种力量本质上就是一种纯破坏性的存在，它们

就像腐烂或死亡的尸体身上的细菌一样，整个尸体溶解的过程它们都是推动死亡的主力军。当一个文明的架构摇摇欲坠的时候，往往是大众把它推向垮台的边缘。也正是在这样的交接时刻，大众身上肩负的重任才得以被显现出来，但是之后，它很快就会被当作一种数量的哲学，而这种哲学似乎就是历史哲学中的唯一种类。

是否我们的文明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呢？很多人都害怕这个会成为事实，我们却还不能理直气壮地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然而，这的确会演变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我们现在都有信任大众统治的倾向，并把自身托付给大众，但他们把面前所有抑制着他们的阻碍都扫除掉，恰好这一事实见证大众缺乏远见的能力。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言论将大众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学习心理学的学生都对大众避而不及，对他们采取一种无视的态度。而且，最近他们对犯罪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到大众的身上，他们认为大众就是引起犯罪的唯一原因。毋庸置疑的是，社会上肯定会存在着犯罪的大众，但是也会存在正直和见义勇为的大众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大众。犯罪的大众仅仅是心理学其中的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大众的心理状态不单只是可以通过犯罪的案件来加以研究，因为犯罪的个案有时候仅仅是个体的邪恶一面的展示，它并不能代替整体。

然而事实上，在当今这个世界，所有的大师、宗教或帝国的缔造者、信仰的传道者、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或者把范围缩

小一点，仅仅是小众族群里面的酋长，他们往往都是无意识的心理学家，他们往往都拥有过人的自主性，对大众的性格了解甚多。正是因为他们对这些性格有着确切的认知，他们才能轻而易举地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拿破仑（Napoleon）就是一位拥有洞穿大众心理能力的君主，正是这种过人的能力才使他后来得以统治整个伟大的法兰西帝国。然而，有时候他却会完全误解其他民族的大众心理；^①正是因为他误解了大众的心理，后来他才做出了挥军进攻西班牙和俄罗斯的决定。这些行为不仅让他臭名昭著，而且在双方对抗的过程中，他的势力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这也使得拿破仑的神话帝国很快遭到倾覆进而成为昙花一现。时至今日，能否修好大众心理学的这门课程已经成了评判政治家们政绩的标准，虽然政治家们都不希望管治大众群体，因为管治他们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政治家们却希望大众的震慑力不要过大，因为如果大众的震慑力过大，那么他们就会反过来管治当权的政治家们了。

只有在洞穿大众心理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明白用法律和体制来规范他们所得的效果是如此卑微，我们才能明白他们自身的观点而非强加给他们的观点是如此无力，我们才能明白应该寻找对大众有震慑力和引诱力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纯粹公平的

① 而且，拿破仑的那些最具洞察力的谏政者也不太了解心理学。外交大臣塔列朗（Talleyrand）曾经写信给拿破仑，他在信中提到：“西班牙把它的士兵都视为解放者。”实际上，西班牙把它的士兵视为捕获野兽的猎物。如果心理学家来自西班牙种族，那么他就很容易洞穿这种事实，因为他的骨子里就带有这个种族的心理。

理论规律，因为前者才是引导他们向前的事物。譬如，一个希望强制征收新税的立法者是否会选择那种理论上最公平的法规呢？绝对不会。实际上，最不公平的法规也许对大众而言恰恰是最好的。与此同时，那种最不起眼以及看上去负担最少的法规也许会是最能让人容忍的。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原因，所以对于一种间接的税收，无论它是多么不合情理，大众往往能够接受。因为它采取的收费方式是通过分散的手段获得的，也就是消费者每天花钱买的一小样消费品当中，其实它们都已经是间接扣了税。这种收费方式并不会影响消费者的购物习惯，而且它也是在大众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是在薪酬或者收入这些与消费者利益直接挂钩的事物上进行等量征税，也就是说消费者一次性要付够所有的税款，那么即使这种新的征税方法在理论上能比前面所说的间接征税所要承受的负担少十倍，大众也还是异口同声地反对这种征税方式。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数量相对大的事物看上去总是会比分散的不起眼的小量事物的总量要大，并且前者比后者更容易触动人的联想能力。这种新的征税唯有通过一个个小部分的收取才能得以实现，但是这种经济的推进里面包含了许多大众无法具备的洞悉能力。

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是最容易理解的一个例子。它的适用性也很容易得到理解。它没有规避像拿破仑那样鼎鼎有名的心理学家们的注意，但是我们现代的立法者却一如这些著名的心理学家们，完全将大众的特征置之不理，根本找不到管理大众的方法。从这个层面上看，他们所获得的经验还不足够多，因

此他们绝不能在一些纯粹理性的教义的基础上来开展行动。

许多实用性的应用也许是在研究大众心理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类科学的知识会对卷帙浩繁的历史和社会现象进行阐释，而它给人最鲜明的印象是，这些现象在脱离这类科学知识之后会让人无法理解。我有必要在这里说明一下，为什么那个声名显赫的当代历史学家泰纳（Taine）偶尔会无法理解法国大革命当中发生的历史大事件，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研究大众的智慧。在研究这段复杂的历史时期的时候，泰纳只是把博物学家们所采纳的描述性方法作为整个研究过程的指导方针，而完全忽略了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恰恰是博物学家要去分析研究的一种现象。可是，这些因素正好是历史的真正动机的组成部分。

因此，单单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研究大众心理已经是一项有社会意义的活动。而如果是从它所引发的纯粹性好奇心的本质来看，它也是一项值得研究的活动。它本身具有的趣味性就跟确认一种矿石或者植物的特征一样，通过解码人类活动的目的我们也可以了解人类的特征。我们这次有关大众智慧的研究也许仅仅是一个简要的设想，或者是我们观察之后得出的一个简单的结论，这个简单的结论里面最多的是带有一些启示性的观点。除此之外，我不会强加其他言论。有关的研究工作还会继续进行，以便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加翔实的观点和言论。而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起程。

第一卷 大众心理